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怡保嘉应客锡矿家丘乔研究 (1916-1958)

科目编号: ULSZ 3078

学生姓名: 刘玉敏

学位名称: 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 黄文斌师

呈交日期: 2016年8月19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i
绪论	1
第一节：研究动机	4
第二节：前人研究成果	6
第三节：研究方法	8
第四节：研究难题及本论文不足之处	11
第一章 丘乔的生平事迹	13
第二章 丘乔对社团组织的参与及贡献	20
第一节：初期（1938年-1941年）：以霹雳矿业公会为主	21
第二节：活跃期（1949年-1953年）：以霹雳客属公会、霹雳嘉 应会馆为主	24
第三节：沉闷期（1954年-1958年）	31
第三章 丘乔对社会的贡献	32
结语	42

参考书目	45
附录	
表二：1858 年 1914 年梅州大事记	49
表四：丘乔参与过的社团组织及所担任的职位（1938-1945）	51
表五：丘乔参与过的社团及组织（1946-1953）	52
表六：丘乔参与过的社团及组织（1954-1958）	54
图一：霹雳客属公会有关丘乔事迹的石碑	55
图二：拿乞列圣宫古庙搬迁重建纪念匾	56
图三：日本军政部颁发予丘乔的采矿许可证	57
图四：1946 年 11 月 3 日《南洋商报》〈怡保五君子抗敌得奖状〉	
报导	58
图五：丘乔葬礼留影	59
图六：丘乔墓碑（一）	60
图七：丘乔墓碑（二）	61
图八：丘乔墓碑（三）	62
图九：丘乔在加基武吉锡矿场工作情况	63
图十：丘乔在加基武吉锡矿场工作情况	63
图十一：已发展成旅游景点的加基武吉锡矿公司（一）	64

图十二：已发展成旅游景点的加基武吉锡矿公司（二）	64
图十三：矿工在暗窿（Gua Kelam）留下的开凿锡米仓的痕迹	65
图十四：早期为锡矿工业人供应的电源，经过政府修葺后保存下来	65
图十五：加基武吉埠锡矿山石垅	66
图十六：玻璃市加基武吉老人院	67
图十七：玻璃市加基武吉拿督公庙	67
图十八：霹雳客属公会历任会长照片	68
图十九：霹雳嘉应会馆墙上悬挂历届正副会长一览表	69
图二十：霹雳嘉应会馆礼堂侧悬挂改建会所捐赠者照片	70
图二十一：各会馆代表前往怡保集中营慰问侨乡	71
图二十二：1989年4月3日《新明日报》特刊——〈列圣古庙今庆 100周年〉报导	72

怡保嘉应客锡矿家丘乔研究
(1916-1958)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资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3ALB04935

日期：2016年8月19日

摘要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拉律地区（Larut）及近打区（Kinta）锡矿业的兴起，霹雳州成为了马来亚联合邦锡矿区最多，锡产量也最多的州属。根据 1901 年的人口统计，锡矿最多的地区也是客家人最集中的地区。当时，霹雳州近打区及仍是雪兰莪州首府的吉隆坡的客家人的总数就等于了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这四州府中客家人总数的三分之二。而近打区的矿工中，超过八十巴仙都是客家人。（赖观福，1999：13）之后的十年间，霹雳州客家人人口也是不断地增长，从 1901 年的 35,642 人增加到 1911 年的 68,825 人。可见，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霹雳州的锡矿开采几乎是由客家人所包办。

因缘际会，当时霹雳州许多著名的矿家都是客籍人士，如：郑景贵（1821-1901）、姚德胜（1859-1915）、梁碧如（1858-1912）、胡子春（1860-1921）、梁燊南（1889-1940）、刘伯群（1889-1940）等。这些客籍矿家一开始在霹雳州开辟锡矿业时，往往都是处于不利的生存条件之下、面临艰险。可是他们不惧艰辛、刻苦奋斗，成就一番事业之后，也不忘回馈社会，对霹雳州的锡矿地区，如太平、怡保等地的发展及建设都贡献了不少。

本论文主要研究怡保嘉应州客籍锡矿家丘乔（1903-1958）。丘乔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丘乔有别于怡保同时期的其他锡矿家。他在怡保设锡矿公司的同时也将锡矿事业拓展到玻璃市州，那是当时怡保锡矿家都无人问津的锡矿区。此外，他来到马来亚之后，从未回到中国去，这与当时怡保锡矿家在中国抗日时期纷纷回国支援的心态有明显的差别。日治时期，丘乔还冒着生命危险与日方交涉，为失业矿工提供工作机会，救出被收押的客籍同侨，此时他关注的对象也不再是祖国而是马来亚人民。

本论文将划分成三个章节，对丘乔进行研究。首先，第一章节将论述丘乔的生平事迹。此章节主要论述丘乔南来之后在怡保以杂货事业白手起家、投入锡矿事业的打拼过程。笔者也会对丘乔远赴玻璃市州开办锡矿事业的过程进行探讨，从而探究出丘乔的一些性格及待人处世。

第二章节则是探讨丘乔所参与及活跃的社团组织。丘乔发展事业的同时也非常关注怡保社团的发展，尤其是以客家人为主的地缘性组织——霹雳客属公会及霹雳嘉应会馆。他携手怡保锡矿家成立了霹雳矿业公会，为锡矿家们解决锡固本纸（tin quota）归属的问题。日治时期之后，丘乔参与了以复兴马来亚锡矿业及华人社区为目的而成立的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及马华公会，为复兴马来亚的社区尽一份力。在此，笔者将就丘乔参与社团的二十年时间分成三个阶段，分析每个阶段丘乔所活跃的社团的性质。

最后，第三章节里则是论及丘乔对社会的贡献。虽然丘乔大多数时间都往来于怡保及玻璃市的锡矿公司，并且忙碌于许多社团活动，可是他为善却不落人后。到拿乞埠（Lahat）及玻璃市的加基武吉埠（Kaki Bukit）开办锡矿公司时，丘乔曾经协助迁移庙址及资助老人院经营。而日治时期，丘乔也为部分失业的矿工提供了工作机会，同时也协助从宪兵手中救出许多客籍同侨。因此，笔者将在此章节罗列出目前所找到的关于丘乔对社区的贡献。

早期丘乔来到马来亚或许是出于谋生、解决生计困难，但是在马来亚经历过日治时期之后，丘乔的国家及身份认同有渐渐由祖国转移到马来亚的现象。当时的他在日治时期已经自觉地担任起保卫国家及维护人民权益的工作，并且在战后投入到马来亚社区的重建及复兴。

本论文最大的贡献是通过报章、刊物等文献以及口述历史的方式勾勒出丘乔这号人物的生平事迹、对社团的参与及对社会的贡献，尤其以他在日治时期对社会的贡献为主。然而，由于时间不足无法找到更多的原始资料加以佐证及补充，因此希望日后对此研究课题有兴趣者可以再继续研究丘乔在日治时期对怡保社区的贡献，同时将研究方向扩展至丘乔开设锡矿公司的地区，探讨丘乔在那些地区是否有其他的贡献。

【关键词】丘乔、霹雳矿业公会、霹雳客属公会、霹雳嘉应会馆、贡献

致谢

忙了好一阵子，才终于迎来了替论文撰写致谢词的这一环节，也意味着论文终于进入尾声，即将完成了。撰写一份毕业论文确实有别于导师于平时课堂上所要求提交的个人作业及组别报告，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收集资料，之后还要注入更多心血去分析资料，才能正式提笔开始撰写。因此，能完成这份毕业论文对笔者而言，实属难能可贵。笔者也自认仅凭我一人之力，确实无法将这份论文完成。所以，笔者想在此借着这个机会向曾经提供资料、协助过笔者的人致上谢意。

首先，笔者最想感谢的便是时刻陪伴在身边的家人。在笔者撰写论文这段期间，父母亲无时无刻给予的精神上的支持让笔者深深感动。当笔者为论文一筹莫展时，他们会不时鼓励笔者，关心笔者的论文进度；当笔者稍有懈怠时，他们也适时的加以督促，让笔者倍感温馨。每当笔者独自从家乡前往金宝与老师面谈时，一路上总会收到父母亲不时的电话联络，操劳着笔者是否安全。同时，笔者也十分感谢弟弟不厌其烦地充当司机，接送笔者到车站搭车前去金宝；还要感谢妹妹在笔者遇到瓶颈时，总会劝笔者暂时放下论文，适时娱乐，让笔者得以化压力为动力。有了家人精神上及金钱上的支持，笔者才能顺利地完论文写作。

当然，笔者也想特别感谢从旁协助笔者完成论文的导师，黄文斌老师。感谢老师将笔者领进本土研究这个领域，让笔者对马来亚早期的历史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此外，笔者也非常感谢老师在百忙之中特地花时间抽空与笔者面谈，指点笔者论文的不足及纰漏之处。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导让笔者获益匪浅，笔者在此向老师致以万二分的谢意！同时，完成论文的这一路上肯定也带给老师不

少的麻烦，因此笔者也想在此向老师致歉。另外，笔者也想趁机感谢黄老师的硕士论文指导生——慧倩学姐。学姐在收集自己的论文资料的当儿，曾多次发现与笔者论文范围之内有关的资料，并且也非常慷慨地将资料与笔者分享。学姐三番四次的慷慨解囊也让笔者铭记于心。

再者，笔者也想要感谢协助笔者完成论文的另一功臣——霹雳嘉应会馆的副会长拿督丘才幹先生。身为笔者论文研究对象丘乔的儿子，丘先生在知道了笔者以丘乔为论文题目后，即刻便将笔者介绍给他的两位哥哥即丘才基局绅及丘才淼先生，好让笔者能知悉更多关于丘乔的事迹。丘才幹先生也曾驱车带领笔者远赴玻璃市州加基武吉埠探访丘乔生前的开办的锡矿场，同时也联络了当地许多曾听闻过丘乔事迹的人士，让笔者进行口述历史。对于丘才幹先生的大力协助，笔者不胜感激！在此，笔者也想感谢曾经参与口述历史的所有受访人士——潘东生先生、罗伸波先生、蓝基鸿先生、古健庭先生、赖观福硕士、张练棠先生等。若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笔者确实难以厘清论文的方向。谢谢你们！

最后，笔者也想感谢大学生涯一直陪伴在侧的朋友们，尤其是祖怡及诗琪。庆幸他们较早一学期完成论文，因此笔者在撰写论文遇到困难，向她们讨教时，她们也不吝啬地提供协助。非常感谢她们不时送上的鼓励及加油！同时也感谢一起完成论文的同学——瑞玮和俊华，感谢他们一路来的支持并且不时给予意见，互相扶持的感觉真好！

绪论

霹雳州较早普及的锡矿开采聚集在霹雳河流域的拉律地区（Larut）。拉律区原是人烟稀少的沼泽地带，直到 1847 年，Long Ja' afar（1790-1857）发现克连包（Klian Pauh，今太平）一带蕴藏丰富锡苗，于是雇用了三名华工协助开采锡矿，还引进槟城的华籍矿工到拉律区去采锡。随着 Long Ja' afar 在克连包开采锡矿一事传开后，大批的中国矿工随即蜂拥前来马来半岛。1872 年，拉律地区的华籍矿工已达大约四万人，其中又以广东人及客家人为多。（马来西亚华人矿务总会，2002：12）其时，拉律地区成了霹雳州锡矿业重镇。

相较下，霹雳州另一锡矿区——近打区（Kinta）一带的怡保（Ipoh，旧名坝罗）、务边（Gopeng）、甲板（Papan）、和丰（Sungai Siput）、金宝（Kampar）、拿乞（Lahat）、华都牙也（Batu Gajah）及万里望（Menglembu）等地的锡矿业的发展则是要比拉律区的来得要迟些。早在 1874 年，近打区就已有较小型的采矿工作在进行，可是因为处于内陆地区，再加上交通设备的匮乏造成运输的不便，所以近打区锡矿的开采并没有拉律区的锡矿开采那般庞大，也较少受到矿工们的重视。然而 1880 年近打谷（Kinta Valley）一带被发现蕴含丰富的锡米之后，近打区的锡矿开采便吸引了许多矿工及矿主的关注并且纷纷转移到该区去开办锡矿事业，也因此造成了近打区华人人口迅速增加，从原本 1875 年的大约两千名矿工增加至后来 1882 年的四千人；1885 年的五千人；1886 年的一万八千人；1887 年的二万五千人；1888 年三万八千人。13 年内近打区华人人数共增加了大约三万六千人，平均一年就有大约 2770 人到近打区。而人口的增长也与近打区的锡矿开采息息相关。充足的人力资源让近打区的锡

矿业得以蓬勃发展，更在 1888 年掀起了一股淘金热，吸引了更多的人到那里去。此后，近打区的锡产量也逐渐凌驾于拉律地区的锡产量之上。

十九世纪末，霹靂州也因为拉律及近打两个地区所贡献的丰富锡产而成了马来亚联邦锡产量最多的州属（见表一）。

表一：马来联邦各州锡生产量（1890 年至 1899 年）

年份	霹靂	雪兰莪	森美兰	彭亨	总数（担）
1890	237,000	175,000	36,000	6,000	454,000
1891	242,000	195,000	41,000	6,000	484,000
1892	278,000	208,000	70,000	7,000	563,000
1893	316,000	253,000	58,000	7,000	634,000
1894	396,000	339,000	43,000	8,000	786,000
1895	400,000	361,000	39,000	9,000	809,000
1896	383,000	347,000	50,000	11,000	791,000
1897	352,000	302,000	49,000	9,000	712,000
1898	331,000	277,000	46,000	11,000	665,000
1899	319,000	255,000	57,000	13,000	644,000

资料来源：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2002：24

同时，霹靂州的锡矿生产中心也逐渐从拉律区开展到了近打区一带。当时，怡保作为近打县最大的城镇，市区内的建设也越趋完善，除了有连贯其他地区的公路、与其他地区通讯的电讯体系之外，还建了医院、火车站、中央警署、砖墙房屋、华人戏院等设施。有了这些设施，再加上在锡矿业的繁荣发展，怡保便在 1889 年后渐渐取代太平（Taiping）成为霹靂州的锡矿业、商业及社会中心。而有“锡都”之称的怡保处于近打河流域上游，绝佳的地理位置也确保了源源不绝的锡产，促使了更多的中国矿工前来开辟锡矿事业。

早期的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其中以闽南人占大多数，其次是客家人，再其次是广府人，最后则是潮州人。移民到达马来亚之后通常是根据方言

群分布在不同的地区，从事不同的职业。其中客家人多是从事采锡事业、农事或小型商业。十九世纪是怡保锡矿业最繁盛的时期，当时与锡矿业有关的行业都由客家人所包办，尤其是采矿工作。随着十九世纪伦敦市场锡价的提高，不少矿工的收入也因此增加，以致飞黄腾达，成为矿主，开办自己的锡矿公司。一直到二十世纪末，仍有许多客籍人士南来之后到怡保借由发展锡矿业白手起家。因此，怡保锡矿业在各别时期的发展也造就了各别时期富甲一方的锡矿家，如：较早期的有梁碧如（1857-1912）、姚德胜（1859-1915）、胡子春（1860-1921）等人；较后期的则有梁燊南（1881-1940）、张珠（1885-1954）、刘伯群（1894-1971）、胡曰皆（1907-1961）等人。而本论文所研究的丘乔是属于怡保较后期的锡矿家之一。笔者将会在本论文中探讨丘乔的生平事迹、对社团组织的参与及对社会的贡献。

第一节：研究动机

十九世纪，怡保有许多以锡矿业起家的锡矿家，他们之间有些共同之处，同中又有一些异处。早期的梁碧如、姚德胜及胡子春等人基本上都可算是怡保的开辟者，他们以锡矿业起家之后，便在怡保倡组社团组织、开办新式学校、投身社会公益，见证了怡保的发展及建设。而后期的刘伯群、张珠、胡曰皆、李桂和（1880-1953）等人则有不同的经历，他们经历过中国抗日、马来亚日治时期，当时人民遭受压迫，让心系祖国的他们奋起为中国的抗日努力。他们组织救济总会、筹赈会、赈济委员会并积极投入筹款抗日救国的事业。

然而，与他们相比，日治时期，丘乔其实并不太活跃于筹赈会等组织，相反地，他注意的是马来亚这片土地，关心这里的失业矿工以及受日本宪兵压迫的华人。同时，还有资料显示丘乔曾经协助收集日军情报以协助抗日工作。可是在论及马来亚日治时期的华人时，注意力往往都是集中在筹赈抗日的侨领身上，而是较少关注日治时期对社会地方有所贡献的领袖。因此，笔者才希望透过此论文将丘乔在日治时期对社会的贡献记录下来。

此外，早期南来的矿工在马来亚致富后往往都会回到祖国去，资助自己家乡的建设及发展。姚德胜致富之后，晚年回乡定居时捐资救灾、创建学校并且陆续携带乡人前来自己的锡矿公司工作。再如李桂和，就曾经多次回到家乡五华县华城镇，在家乡遭遇荒灾、水灾时捐钱救助乡民，还在镇内兴办学校及资助交通公路建设。与上述矿家不同，丘乔来到马来亚之后未曾回到家乡水南堡去。他一直坚守在马来亚，尽管马来亚经历日治时期之后，还面临马共的威胁、紧急法令的实行等时期。因此，这个不同之处也是笔者兴起研究丘乔的原因之一。

此外，丘乔与众多怡保锡矿家的差别在于他除了在怡保地区开设锡矿场之外，锡矿事业还远达玻璃市州的加基武吉埠。玻璃市的锡矿业与怡保的锡矿也有着很大的区别，就连开采锡矿的方式也截然不同。怡保锡矿业大多数以铁船、沙泵、洗硫琅的方式进行，可是玻璃市州却是在山中的石垅打洞，再以炸药炸开，再用沙泵淘洗。那么丘乔究竟为什么会远赴玻璃市开设锡矿场呢？笔者一直对此事感到不解，因此也希望透过资料收集时能够一探究竟。

第二节：前人研究成果

目前笔者所发现的前人研究成果与丘乔相关者只有一个：

(一) *Ho Tat Ming* 所著的 *Ipoh When Tin Was King*。然而，作者并未深入探讨丘乔，只是在论述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第七任会长丘才基局绅的事迹时，稍微论及其父亲丘乔的事迹。作者仅在书中提到丘乔在 1916 年飘洋过海南来之后受聘于姚德胜，1930 年正式从事锡矿业，并在金宝、美罗 (Bidor)、波赖 (Kramat Pulai)、拿乞、和丰开设矿场。后来，拿乞埠与和丰埠沦为紧急法令时期马共的“黑区”，丘乔于是才决定远赴玻璃市加基武吉埠开设锡矿公司。从中，可以得知丘乔南来的正确年份以及开设锡矿公司的情况，然而却无法知悉更多关于丘乔的资讯，如对社团组织及社会的贡献等。

而其他资料多是与丘乔的生平事迹有关，其中包括：

(一) 霹雳嘉应会馆特刊编辑委员会所出版的《霹雳嘉应会馆七十周年纪念新厦落成开幕特刊》就仅简明扼要地将丘乔的生平事迹及参与过的社团组织记录在案。可是，特刊的文章中并没有明确及详细地记录下丘乔在各社团任职的年份，而且所记录的资料也不算完善。因此，笔者为了进一步考证，只能到会馆查阅其他的特刊。

(二) 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出版的《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曾经刊载当时秘书王雪桥 (生卒年不详) 回溯霹雳客属公会复办之时的情况。笔者借此窥探出丘乔在霹雳客属公会复办公会及筹建新会所时的贡献。庆幸的是，文中都有仔细记录下复办公会的明确时间、筹款所得的明确数额等资料，是本论文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同时，此特刊中还记载了丘乔父

亲丘杞华（1865-1947）的事略，让笔者从中探得丘父前来怡保开辟事业的经过，也是笔者借来佐证丘乔随母亲前来投靠父亲的资料。

第三节：研究方法

笔者主要以以下三种方法进行研究：

（一）文献研究

笔者主要先从《霹雳嘉应会馆七十周年纪念新厦落成开幕特刊》的记录中得知丘乔的生平事迹，包括他所开办的锡矿公司以及他曾经参与过的社团组织，然后再查阅会馆出版的其他刊物或书籍，如《嘉应故乡谈丛》、《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霹雳嘉应会馆成立一百周年纪念特刊》、《霹雳客家公会庆祝成立 74 周年纪念暨承办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 2015 年度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特刊》等，以作旁证。

另外，笔者也参考了一些与丘乔有关或曾经谈论过丘乔的书籍，如 *Ho Tat Ming* 所著的 *Ipoh When Tin Was King*、许云樵所编《1937-1945 新马华人抗日史料》等。同时，笔者也翻阅了《南洋商报》于 1938 年至 1958 年的报章以知悉丘乔在霹雳嘉应会馆及霹雳客属公会以外参与过的其他社团，以及丘乔对社会的贡献或他曾经捐献的记录。

此外，为了窥探丘乔在霹雳州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对他身边的其他锡矿家有所了解，笔者也参考了一些记载了有关霹雳州锡矿业发展及其他霹雳州人物传记相关的书籍，如林水椽、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所编著的《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马来西亚华人矿务总会所出版的《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何启良所主编的《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等。

（二）实地考察

由于缺乏文献资料，笔者只能到一些丘乔曾经参与过的社团组织去做考察。首先，笔者到访霹雳嘉应会馆及霹雳客属公会，查阅该会馆藏书及历届特刊。通过会馆的协助，笔者也找到了一些丘乔任职期间所拍下的旧照片以及开会时的会议记录。

值得一提，笔者发现霹雳客属公会会所内悬挂了一块记载着丘乔事迹的石碑，是客属公会新会所建成之后，会所同人为了纪念丘乔在筹建会所的贡献而篆刻的，以供后人铭记。此外，霹雳嘉应会馆的礼堂周围的墙上悬挂了许多曾经倡办该会馆及在改建新会所时曾经捐献过的先贤的照片。笔者发现丘乔的照片挂在嘉应会馆礼堂左侧，亦由此得知丘乔曾经对嘉应会馆作出捐献。

此外，在与丘乔之子拿督丘才幹（1944-）接触之后，笔者也在拿督带领下前往丘乔的墓地进行考察。笔者发现丘乔的墓碑上有书法家骆清泉所撰写、崔大地先生所临摹的碑文。并非所有人的墓碑上都会刻有碑文，但丘乔的墓碑上不仅刻有碑文而且还是由两位颇有名气的书法家所撰书，可见丘乔在十九世纪末的怡保确实有少许名望。拿督丘才幹还带领笔者前往丘乔曾经协助迁移庙址的拿乞埠列圣宫古庙去考察。笔者也因此获得与丘乔迁庙相关的一些报章资料。另外，笔者也与拿督丘才幹一同前往玻璃市加基武吉埠去考察丘乔曾经开办的锡矿场，并到暗窿（Gua Kelam）即当时的丘乔开采锡矿的地区去察看。

另外，笔者曾到访霹雳中华总商会、霹雳中华大会堂等与丘乔有关联的地方去寻找丘乔的事迹，可惜未有所获。

（三）口述历史

笔者也通过访谈及口述来获得与丘乔有关的资料。首先，笔者采访了丘乔的三名儿子——丘才基局绅（1930-）、丘才淼先生（1937-）及拿督丘才幹先生。透过访谈，笔者对丘乔的生平事迹得以更了解，而他们也慷慨分享了丘乔的旧照片及一些有关丘乔的文史资料，如论文中提及的允许开采锡矿许可证等。

此外，笔者也采访了霹雳嘉应会馆现任副会长潘东生先生（1931-）。丘乔任职霹雳嘉应会馆副会长之时，潘先生就已经加入霹雳嘉应会馆，因此，对于丘乔的事迹，他也听闻过许多。同时，他也十分了解怡保的历史及发展，这些资料往往都是文献所忽略的。笔者也曾与拿乞埠列圣宫古庙主席古健庭先生进行访谈，而古先生也对于丘乔协助迁移庙址之事娓娓道来，让笔者获益良多。

到加基武吉埠考察时，笔者与拿督丘才幹也庆幸找到丘乔加基武吉锡矿有限公司已故矿工蓝水木先生的儿子——蓝基鸿先生（1948-）及加基武吉埠开埠功臣罗通之子——罗伸波先生（1946-）。丘乔在世时，蓝先生及罗先生虽然年纪非常小，但是都曾听闻过父亲谈起丘乔，因此对丘乔在加基武吉埠开设锡矿公司的事迹也略知一二。同时，笔者也通过拿督丘才幹联络上出生在加基武吉埠的赖观福硕士（1935-），与赖硕士访谈之后，笔者也对丘乔到加基武吉开矿场的过程更加了解。

第四节：研究难题及本论文不足之处

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笔者最大的问题是文献资料的不足，尤其是在查找丘乔在霹雳矿业公会、霹雳客属公会及霹雳嘉应会馆担任会长及副会长时所参与的会议的完整会议记录、丘乔参与霹雳中华总商会及霹雳中华大会堂的资料、丘乔资助国民党所捐出的金额数目以及丘乔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当中很多资料都因为战乱、会所日久失修或多次搬迁而遗失。

目前笔者所找到关于丘乔对社会的贡献中，很多资料都只有一笔记录，或是通过口述历史得到的资料，往往还未找到其他方面的证据作为旁证。就如丘乔在日治时期曾经协助中国中央部门收集日本军方情报的这个贡献，就仅出现于 1946 年 11 月 3 日这天的《南洋商报》上，尚未从其他报章或文献发现相同的资料，且之后也没有出现其他的相关资料。再加上报章中虽说到中央政府为了感谢丘乔的贡献，特颁予奖状奖励，但是笔者目前对此奖状仍是遍寻不获，也因此该贡献的可信度也大大减低。但是笔者认为，即使此贡献的资料不足，但是还是可以记录在案的，因为若是此新闻属实，那丘乔对当时的社会是功不可没的，所以此记录也不应该被抹杀。

由于时间及金钱的限制，笔者对于丘乔在玻璃市州的动向是一知半解，资料也只停留在丘乔开办锡矿公司、协助迁移庙址、资助老人院的资讯而已。然而，丘乔还曾经作为马来西亚华人矿务总会在玻璃市及吉打州的委员，但是也没有资料显示丘乔作为该组织的委员曾经为地方上做出什么贡献。同时，除了拿乞埠，丘乔也曾经到金宝、美罗、和丰、甲板、督亚冷（Tanjung Tualang）及九洞（Jelapang）开办锡矿公司，或许丘乔也曾经在这些地方作出一些贡献，但却因为时间不足的关系，笔者未能深入一一探查。

目前笔者仅将所收集到的资料一一记录在本论文中，于此罗列并梳理了丘乔的生平事迹、对社团的参与及对社会的贡献。希望日后有兴趣知道更多关于丘乔的事迹的研究者可以作为依循，出现更新资料时也可以加以改正。

第一章 丘乔的生平事迹

丘乔（1903-1958），字乔生，祖籍广东省嘉应州梅县水南堡中心坝。13岁随母亲黎银英老夫人（1876-1946）、兄丘火生（生卒年不详）以及弟丘水生（1906-）到怡保与父亲团聚之后，便从此定居马来亚。最初以杂货事业起家，后转入锡矿业，在怡保多处及加基武吉埠设有锡矿场。事业有成之后，加入霹雳矿业公会、霹雳客属公会、霹雳嘉应会馆、吡叻华人福利会等社团，服务人群。日治时期，曾提供失业矿工就业机会、救助被日军收押华人及捐资协助中国政府派遣前来的抗敌机关。

丘父丘杞华（1865-1947）早在 1916 年前就已经漂洋过海南来。目前的资料只提及丘父最初的落脚处是苏门答腊的亚齐（Aceh），可惜在亚齐并未获得任何工作机遇，遂辗转来到怡保安居，并在怡保火车局担任专门修补蒸汽机及火车发动机的漏气孔口的技工。然而，丘父离开水南堡的确切时间及原因都未能再进一步证实，惟笔者认为丘父之所以会千里迢迢南来，很可能是因为他出生后，梅县不仅天灾不断，而且还经历太平天国的起义失败、百业未兴，再加上之后延续不断的国共内战所造成的困苦生活（见附录表二），致使丘父出此下策，离开家人远赴南洋谋生。根据怡保火车站的建成及启用年份便可以推测丘父抵达怡保的时间。

1894 年，连接着怡保（Ipoh）及华都牙也（Batu Gajah）的铁轨就已建成，怡保火车站的建筑工程则是 1914 年才开始，1917 年完成。因此，可以推测丘父可能是在 1914 年之后才来到怡保。而丘父来到怡保的原因除了可能是上述的原因之外，也与当时霹雳州的锡矿业的兴起有关，铁轨及火车站的建成就是为了连接及输送所采集的锡产到港口去。后来因为在火车局的微薄薪资没办

法负担一家五口的开销，丘父才转而在怡保市场经营家禽业，贩卖鸡鸭。数年后，发展成了该行业的牛耳。

丘乔跟随母亲到怡保后，只在霹雳嘉应会馆附属的明德学校念了两年的书，便辍学到已故乡贤姚德胜（1859-1915）的“德和商号”工作。约一年后，丘乔便辞去工作，自行做起小生意。他骑着自行车到巫人甘榜去收集并购买家禽然后再到华人住宅区兑售。虽然这一买一卖的转手生意赚到的钱不算多，但确实让我们看到丘乔对生意商机的敏感度，16岁便已懂得如何利用自己拥有的资本来创造赚钱的机会。同时，笔者也认为丘乔年幼经商的经历除了基于他对事业积极进取的个性使然之外，环境的因素也是不容忽略。丘乔很有可能是因为父亲当修理技师的薪资负担不了家里的开支才会年纪轻轻的就自觉地做起了小生意，以减轻父亲的负担；但也很有可能因为父亲经营家禽业的关系，丘乔在耳濡目染之下，学到了一些贩卖的技巧，才决定离开市场，独立到偏远的住宅区去转手买卖家禽。尽管如此，事实还是证明了丘乔也确实是个做生意的料子。

18岁那年，丘乔再次向人展示了自己不凡的创业精神，在怡保马来王路创立了自己的首间商号——怡兴杂货店。经营杂货店期间，丘乔的一位同学曾经讥笑他，送了他一副对联，曰：“生意兴隆三个月，财源广进一百天”，暗讽丘乔经营的生意不会成功且很快就会倒闭。丘乔听后不但不气馁，反而更努力地经营自己的事业。凭着坚毅的精神，丘乔的事业渐入佳境。1927年，24岁的丘乔在怡保创办了另一间杂货店——万福美商号。同年，还在泰国合艾埠（Hatyai）创办了万成美联号，专门经营泰国农作物及家禽的进出口生意。可

惜，好景不常在，丘乔的事业正迈向繁荣时，却迎来了第一次世界经济大萧条（1929年~1933年）。

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着实给了作为橡胶及锡米原产国的马来亚重重的一记打击，而且经济的不景气一直低迷延续至1933年。百业萧条造成当时马来亚失业人士剧增，许多漂洋过海南来的华籍劳工都被遣散回国，而甘愿留在马来亚的劳工则是过着有一顿没一顿、三餐温饱都成问题的生活。与此同时，丘乔的杂货及进出口贸易便成了经济大萧条的受害者，只好在这段期间停办。

然而，经济大萧条也可说是丘乔由杂货业转入锡矿业的一个契机。锡矿业在遭受了经济大萧条的打击后，锡价一落千丈。为了控制和管理锡的生产量以便让锡价回升，1931年便产生了第一次的国际锡协定。锡的产量受到固本纸的限制后，锡价也逐渐回升。丘乔正是在1935年转入锡矿业，并在之后的23年间在近打地区多处及玻璃市的加基武吉埠开设了多间锡矿公司（见表三）。

表三：丘乔经营锡矿公司的情况（1935-1958）

金宝东兴港金胜公司	1935年-1937年
拿乞新昌兴锡矿公司	1940年开办； 1941年-1947年停办； 1948年-1952年复办
甲板	1945年-1946年
和丰连登路	1948年-1953年
九洞	1948年-1952年
加基武吉 王武锡矿公司	1948年-1952年
加基武吉锡矿有限公司	1948年-1962年（丘乔逝世后由儿子接手）
督亚冷	1953年-1955年
新波赖新乔记锡矿公司	1957年-1973年（丘乔逝世后由儿子接手）

资料来源：丘才基、丘才淼、丘才幹（2015）

当中，丘乔开设的多家锡矿公司都不是单靠一人之力，就如金宝东兴港（Tronoh Mines）的金胜公司、拿乞埠的新昌兴锡矿公司、加基武吉王武锡矿公司及加基武吉锡矿有限公司都是丘乔与友人一起合资创办。不仅如此，他在1945年成立的专营泰国进口米食的贸易公司以及在檳城成立的土产店——恒贸易有限公司，也都是和朋友一起合作。1951年，丘乔因为霹雳客属公会的活动，认识了当时驻居客属公会隔壁的前中华民国驻吡叻领事马天英先生（1900-1982）。两人相识甚欢，还连同怡保及吉打州著名侨领一起创设了位于吉打州高岭（Kodiang）的中马碾米公司。可见，丘乔确实是个颇有远见以及生意手腕极佳、善于与人打交道的生意人。他自知自己的资金状况，即使想发展事业，也是按部就班，而不是妄想一步登天，反而是与相熟的友人一起合作，造福同乡。此外，丘乔的友人及侨领会同意与丘乔合作或许也是因为信任丘乔的为人及经营方式，这也再次证明丘乔经营公司的不凡手腕。

丘乔的锡矿事业可谓波折重重，开设锡矿公司时多次遇到锡固本纸归属问题，多个锡矿场也常因为锡产不理想而停办，有时则是因为采矿设施及技术的问题而难以继续。日军侵略时，马来亚的矿场都难逃停办命运，丘乔经营的多个矿场也是如此。日军投降后，拿乞埠及九洞埠的锡矿场又因为受到马共份子的滋扰而关闭。然而，一次次的挫折并没有将丘乔击倒，相反地丘乔吸取失败经验后努力改善，更是积极地另觅他处东山再起。面临马共份子的威胁，丘乔不妥协，而是强硬对待，最后索性关闭矿场。

因此，丘乔才会远赴玻璃市州拓展锡矿事业。说起在玻璃市州经营的这两个锡矿公司，那就不得不谈到丘乔的过人胆识及魄力。有别于霹雳州的锡矿业，玻璃市州的锡矿采集不是在平地而是在石洞或石垅中进行并且需要以石炮

炸开怀疑有锡苗的洞口，然后再用沙泵式方法清洗金山沟收取锡苗。但是，这种方法可说是非常盲目、完全靠运气，因为怀疑藏有锡苗的洞口被炸开之后，可能是一场欢喜一场空，而且这种采锡方式危险重重，随时发生意外。然而，丘乔却不惧艰辛，只因为一次的机缘巧合，认识了王武锡矿有限公司（Ong Bu Tin Mines Ltd）的创办人——槟城潮籍闻人胡福德老先生（生卒年不详），便在他的邀约下加入该公司任总经理，毅然远赴玻璃市州发展锡矿事业。而这跨出怡保开采锡矿的行为在当时怡保的矿家中实属罕见。而丘乔的魄力及创业的冒险精神也让他的锡矿公司发展成当地最大的采矿公司。

加入王武锡矿有限公司之后，丘乔购入了 250 马力的柴油机及发电机从而加大电源引进灯火入石垅，还解决了较大的沙泵没办法进入洞口进行冲洗工作的问题，方便了矿工工作，也因此让该锡矿公司的锡产量由每月 400 担增加到最高每月 1200 担。此外，丘乔在玻璃市州发展锡矿事业时还协助解决了当时暗窿（Gua Kelam）矿山的矿主之间的纠纷。当时两大矿主李氏及梁氏都在同一个地方开采锡矿，梁氏矿主因为李氏矿主不给予让路而无法继续开采工程。为了平息纠纷，丘乔于是资助了大笔资金，购入大批弹药让梁氏矿主在矿山的另一侧另辟洞口继续开采锡矿。值得一提的是，原本是锡矿区的石洞后来也被政府保留并发展成旅游胜地，让旅客游乐的同时还能增进关于采矿工作的知识，可谓寓教育与娱乐。

从丘乔参与的社团及对社会的贡献来看，不难发现丘乔是一直本着造福同乡及同行的精神在服务人群。1935 年，为了解决锡矿家们面临的锡固本纸归属问题，他与一群锡矿家发起成立霹雳矿业公会以维护矿主的利益。1949 年至 1953 年期间，丘乔活跃于霹雳客属公会、霹雳嘉应会馆、马来亚嘉属会馆联合

会。这些组织主要都是以联络南来的客家人感情及为客家人谋福利为宗旨。丘乔是来自梅县嘉应州的客家人，虽然他不曾回去过家乡，可是对于南来的客家人，他则是采取尽力帮助的态度，包括透过社团为他们介绍工作、设立奖学金帮助嘉应子弟。日治时期，为了解决矿工的失业问题及救出被收押的华人，他与友人还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与日军交涉。

可见，丘乔是个乐于广结善缘、以诚待人的人。金保华侨刘仪宾（生卒年不详）曾经提过日军攻下士林河（Slim River）之后，他在美罗（Bidor）的锡矿公司中避难。当时的美罗已陷入于无政府状态，夜间有强盗打家劫舍，白天有日军掳掠妇女，正在进退两难时，友人丘乔（著名矿工），负责怡保侨领的使命，驾着一部小型汽车，车头上盖上一块白布，用红字写着「小岛机关联络员」的字样为护符，是战后第一个由怡保冒险来到美罗的华人，目的是来找他。胆量之大，真是令人佩服（许云樵、蔡史君，1984：259）。战乱之后，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确实大多数人都会想要保全自己，可是丘乔却没有贪生怕死，而是单枪匹马地去到美罗解救朋友，可谓“生命诚可贵，友情价更高”。

丘乔广大的人脉也显现了他以诚待人的为人处世。在奔波于自己的事业、参与各社团活动时，丘乔结识了不少侨领、政治家、记者及文人。在合艾埠经营万美成联号时，他认识了合艾埠客属开埠功臣谢枢泗老先生（1886-1972）。中日战争爆发时期，丘乔作为霹雳矿业公会会长筹賑基金时也借机认识了当时国民党政府代表吴铁城（1883-1953）及当时考察英军防守策略的军事代表团代表商震（1888-1978）。而其他私交甚笃者则有当时的华校总视学官吴毓腾（生卒年不详）及记者冯超然（生卒年不详）。文人书画家则有徐悲鸿（1895-1953）、翁占秋（生卒年不详）、骆清泉（1906-1966）、管震民（1880-1962）

及崔大地（1903-1974），家中更有多幅这些书画家所赠的字画。丘乔于 1958 年 2 月 10 日因脑充血而与世长辞，墓碑上的碑记正是由友人崔大地所书。

丘乔一生虽然书读得不多，可是却凭着刻苦耐劳、奋斗不懈的精神跻身成为十九世纪怡保颇有名气的锡矿家之一。他以锡矿业发迹之后，参与了许多社团组织，更借助社团要职之便提出了不少为同乡谋福利的举措，回馈同乡。

第二章 丘乔对社团组织的参与

丘乔发展锡矿事业的同时还曾参与了许多社团组织，如：霹雳矿业公会、霹雳嘉应会馆、霹雳客属公会、霹雳华人福利会等，冀望借此为民服务。然而，笔者所掌握关于丘乔参与社团组织的资料并不齐全，目前资料只限于 1938 年至 1958 年期间。据资料显示，1938 年之前，丘乔并无参与任何社团；1958 年丘乔过世之后，再无参与任何社团。可惜，在这 20 年间，笔者并未发现丘乔在 1942 年至 1945 年这三年间参与社团组织的任何资料。这可能因为当时属马来亚日治时期，日军侵占马来亚期间，华人社团都被迫关闭或停止活动。除了由日军授意成立的华侨协会外，可说并无其他华人组织。（林水椽、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第三册，1998：366）而且各社团及组织为了避免被日军借机加害而烧毁了各自会馆内的资料，尤其是资助及追悼反日抗战人士的文件，再加上当时许多华文报馆都被日军强制关闭，停止出版。因此，笔者也失去了资料来源，无法完整地整理出丘乔在这 20 年间参与过的社团及所担任的职位。

笔者根据各别时期丘乔在各社团所担任的职务及参与情况将丘乔参与社团的 20 年经历分成三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是：初期（1938 年至 1941 年）；活跃期（1946 年至 1953 年）；沉闷期（1954 年至 1958 年）。笔者这样的划分主要是根据丘乔在各别时期所参与的社团的数量及在各社团所担任的职务的重要性来进行对比。

第一节：初期（1938年至1941年）：以霹雳矿业公会为主

1938年至1945年间，丘乔参与的社团并不多，多数担任社团中董事一职，也并无特别重要的贡献，惟值得注意的是他发起成立霹雳矿业公会，担任首任会长（见附录表四），为会员们解决锡固本纸归属问题。

固本纸（Tin Quota）是马来亚英殖民政府所发的锡矿开采准许证，但只发给地主而不是采矿主。这对采矿主而言是不公平的剥削，因为地主在矿主采了锡矿收成时已经抽佣，而矿主购买固本纸时又需另付一笔钱，再加上固本纸限定了矿主每个月的锡产量，采矿主不得超过产量额。因此，采矿主经营锡矿业往往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

霹雳矿业公会于是在百多名锡矿家为了呈请政府核定固本价格、取消固本联络并恩准屯锡两个月（南洋商报，1938年5月12日：14）的情况下成立。当时锡矿家们齐聚一堂，讨论委派代表出席锡矿副委会一事，并提前预备一致意见，以交由代表转述。为了方便呈请政府的流程及处理相关事宜，与会锡矿家决定成立委员会，名为“吡叻锡业工会”，丘乔被推举为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会成立后便着手起草章程，组织公会向政府立案及登记；聘请顾问，并函復四州府矿务司¹关于矿家对固本纸的意见（南洋商报，1938年5月12日：14）。

之后，霹雳矿业公会屡次与四州府总锡务司交涉有关锡固本纸统制办法，还选出了梁根（生卒年不详）、刘桂林（生卒年不详）、胡家濂（生卒年不详）、李承思（生卒年不详）、丘乔、杨汝恒（生卒年不详）及潘敬亭（？-

¹四州府矿务局（Federated Malay States Chamber of Mines），是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四个州属的矿务局的统称。

1950) 七人负责修改四州府总锡务司所拟定的固本纸统制章程，以让政府采纳（南洋商报，1938年6月14日：14）。公会成立初期，丘乔也亲力亲为与其他矿家一起担负征求会员的工作，负责拿乞、甲板、布先及华都牙也四个地区。

在霹雳矿业公会任职期间，丘乔十分重视会员之间的感情联系。1939年他在公会会所举办了恳亲会招待会员。1941年还在会员大会上提议公会每两个星期举办一次座谈会，让会员们研究矿务及联系感情。除了积极促成会员们联络感情，丘乔也在恳亲会上呼吁会员们回馈祖国：“锡限额增加，锡价起涨，固本价狂跌，影响一般缺少固本及无固本之矿家极大，以是过去因锡限低减及固本价昂贵受影响而停办之矿场，今又相继复办。若干失业工人，亦因而获得工作，故吾人应乘此机会，加紧努力，谋社会之福利，赞助祖国抗战伟业，并拥护英政府之对德义战²。”（南洋商报，1939年9月19日：10）。

同时，丘乔亦十分响应马来亚爱国基金义捐，他在公会的紧急会议上就曾经向会员劝捐马来亚爱国义捐，还提议选出七名委员³代表公会出席1939年9月26日吡叻苏丹所召开的关于马来亚爱国义捐之大会，商讨义捐之事。由此可见，丘乔虽然心系祖国的抗日战争，但同时也将这种对抗日的情绪投射到支持马来亚社会发起的反侵略运动上，这种抗日的情绪在马来亚遭日军侵略后更是达到最高潮，致使丘乔在日治时期仍义无反顾地留守马来亚，保护受压迫的华人。

² 除了轰轰烈烈的筹赈运动之外，马来亚华人在欧战爆发之后，已把抗日运动扩大到反法西斯、反侵略运动。1939年，马来亚华人亦发动赈济英国反德侵略，曾两度慷慨捐输37万5千镑及57万5千镑，共95万镑。（林水椽、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第一册，1998：84）

³ 出席马来亚爱国义捐大会的七位代表共有梁根、丘乔、杨汝桓、李承思、胡家濂、李添胜、张迺常。（南洋商报，1939年9月26日：9）

此外，丘乔也不忘借着公会之便，提携同样远赴南洋谋生活的矿工。他在恳亲会上还提到霹雳矿业公会之所以成立，全基于为社会谋福利，故刻下公会特设法介绍工人工作，如工友欲找工作者，可先到公会登记，同时各矿场欲加雇工人，亦可向公会通知（南洋商报，1939年9月19日：10）。当时慕名而来函的便有一批失业的前龙运矿工⁴，会议议决后，公会同意并批准当中七八十名工友来到霹雳州工作，但附带了一些条件，如：欲前来的工友车资自备、限于佛瑯（锡矿场）工作、以能胜任锡矿工作者为限、待遇与时下在业之矿工相同、可随时解雇惰工者（南洋商报，1939年9月26日：9）。此次会议便是由丘乔主持，并代表公会复函予前龙运工友总代表石凤亭先生（生卒年不详），信中更大力称赞矿工们不为日本人所用的精神。霹雳矿业公会此举除了给予容纳了龙运矿工的霹雳州锡矿工作者的权益一个保障，也解决了许多龙运矿工的生计困难。

后来，霹雳矿业公会因为争取权益成功而在1945年解散，大部分会员也因此加入霹雳华侨矿务公会。虽然霹雳矿业公会被解散了，但是丘乔初试啼声即便成功为社会群体发声的表率是值得赞许的。对此，笔者认为此次的成功对丘乔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促使他往后也更为积极地参与其他社团组织，如：霹雳嘉应会馆、怡保客属公会及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等。

1938年至1941年期间，丘乔参与的社团大多数都是血缘性或地缘性组织即客家人创立的霹雳嘉应会馆及霹雳客属公会，还有业缘性的霹雳矿业公会，而他做出的贡献的受益人也多是客籍锡矿家、矿工及客家人。因此，笔者猜想

⁴ 1938年3月丁加奴州龙运的日本铁矿场工人，（绝大部分为华侨，约2600人）发动罢工，他们不愿为日本人工作，下山（铁山）乘船到新加坡要求筹賑会援助。工人们原是依靠乘矿场火车（运铁矿用）往返矿场的，罢工时日本人不允载他们到20余英里外的龙运市镇，矿工们迫得自行设法。（林水椽、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第二册，1998：18）

丘乔之所以活跃于这些社团可能是因为受到同乡的介绍加入及鼓舞。同时，这时期的丘乔可能是因为事业上有所成就才萌生帮助及回馈自己同乡或同行的念头，而他回馈的对象除了是下南洋来到马来亚打拼的同乡之外，还有远在祖国抗战的战士，体现了他的侨民心态。

第二节：活跃期（1946-1953）：以霹雳客属公会、霹雳嘉应会馆为主

1942年马来亚遭日军侵略期间，所有社团都被迫停办。1945年至1956年可说是马来亚华社乡团的复兴时期，这个时期是乡团纷纷恢复组织，新乡团不断成立和趋向较大联合的阶段，又是乡团从华侨社团性质转变为华人社团性质的时期。（林水椽、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第三册，1998：367）这时期的华人无形中也把马来亚视作政治方面的效忠对象，逐渐开始关注马来亚本土的发展及事务。

1945年之后，丘乔参与的社团除了有之前提及的地缘性质浓厚的霹雳嘉应会馆及霹雳客属公会之外，还包括了许多为了灾后重建及复兴经济文教而设立的团体及机构，如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马华公会、吡叻华教董事联合会、吡叻华人福利会等等（见附录表五）。然而，这么多的机构组织中，笔者认为不可不提的便是丘乔筹建霹雳客属公会新会所及发起设立霹雳嘉应会馆奖学金两事。

一、霹雳客属公会

霹雳客属公会原是由怡保著名侨领梁燊南（1877-1940）所倡办，可惜未及创办成功，梁燊南便不幸逝世，倡办也告终止。后来，侨领刘伯群（1896-1973）、潘敬亭及胡重益（?-1944）以团结海外华侨，以便对中国的抗战做出实际贡献为理由而再次推动霹雳客属公会的倡办。客属公会于1941年创办初期以霹雳嘉应会馆为临时办事处，丘乔便是当时首届董事会的董事之一。可惜随着日军占领马来亚，客属公会也被迫暂时停办。

直到1948年，刘伯群及潘敬亭才在马来亚光复之后再次提出复办公会，并召集首届董事及职员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复办。当时丘乔亦积极出席复办会议并被选为“促进委员会”⁵正主任，负责征求会员的工作。

新一届会员大会于1949年3月6日召开，丘乔被众人公推为主席，同年4月2日正式就职。就职典礼上，丘乔以这番话鼓励公会众人：本会的基础，非常薄弱，一切都急待我们去努力，我们唯有团结，努力，集中力量，集中意志，苦干，快干，才能完成本会的目的。（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出版委员会，1951：727）可见，这时的丘乔对自己作为会长的期许仍是团结客籍人士，并且借此为客籍人士谋取更多的福利。直到后来，丘乔参与了更多跨越族群及帮派的组织之后想法才开始慢慢改变，投入更多的关心予马来亚的所有华人。

丘乔方才当上会长，就被推选为「筹建会所委员会」主席，并着手处理募捐筹建基金的工作。正当募捐工作一筹莫展时，丘乔以他的名义，邀请客属

⁵ 成员尚有：张逊凡、曾亦鲁、赖甲贵、王雪桥、罗美伦、陈震华、蔡任平（1893-1969）、曾智强、徐世琪、黄钦郎、张凤、陈善湘、杨万里、刘文亮、李宽生、李达民、刘晋衡，共十八位委员。新董事产生后，促进委员会将即行解散。（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出版委员会，1951：723）

知名人士到家中欢宴。受邀之人都以为丘乔家里有喜事而纷纷拨电至公会秘书处询问应该送什么礼物。丘乔虽感难为情，但为了公会将来的发展也不说破。宴会当晚，出席人士才知悉丘乔背后的目的，众人不但不怪罪丘乔还对丘乔借私为公感到难能可贵，即席认捐的数额也达到三万多元（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出版委员会，1951：730）于此，可以发现丘乔确实颇有号召力及威信，侨乡们才会一呼百应，纷纷认捐。同时，丘乔借私为公的举措除了体现他的责任感之外，也反映出他精明的募捐手腕。

从筹募改建基金、购买会所、到募集装修费用，丘乔的尽心尽力看在会馆同仁眼里，是一种尽责及可靠地表现。所以当丘乔提议向银行抵押会所商借资金装修会所时，会员都一致通过，并推选他为产业委托人。而丘乔在募捐筹建基金上完全是善用了他的人脉。除了向怡保区属侨募捐，他还乘机向正巧莅临怡保推动组织崇侨银行的新加坡客属总会副会长林师万（生卒年不详）募捐。林师万除了率先捐出三千元，还承诺向胡文虎总会长（1882-1954）劝捐（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出版委员会，1951：731）。此外，丘乔等人为了筹募改建基金，还曾经远赴新加坡及檳城等地呼吁同侨们认捐。而每到一个地方，丘乔等人受到当地的侨领殷勤的招待甚至还设宴欢迎，可见丘乔的人缘之好及人脉之广。

在丘乔等人的努力下，共筹得九万零七百九十元，仍不敷之款项则议决由每名董事每月认捐两元，再向同侨开办的矿场及商店征求月捐，同时也开放租借礼堂让需要者举行婚礼及宴会（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出版委员会，1951：737）。

与此同时，公会会务也是蒸蒸日上，不仅设立了互助部、服务部、国乐股及羽球队，丘乔还不时带领国乐股及羽球队出征外埠，与当地体育人士切磋球技及进行演出，这更是加强了各州属之间客属公会甚至是客属人士之间的情感纽带。1950年元旦日，霹雳客属公会新会所正式开幕。董事会也决定于1951年出版《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记录公会成立、筹建会所及新会所开幕的始末之外，还列有乡贤们的事迹以及其他客属会馆的创建梗概，这也为后人在史料收集及研究方面提供了不少帮助。

丘乔在募集筹建会所基金的亲力亲为、不辞劳苦的精神让人敬佩。虽然说当时购买新会所对“寄人篱下”的霹雳客属公会也已经是件板上钉钉的事了，其他人担任会长也会做同样的事，可是笔者认为丘乔在处理筹建会所这件事上所付出的努力、坚持及严谨态度是不容置疑的，尤其当时丘乔还身兼其他社团的要职。这样的情况下，丘乔虽然分身不暇，可是也尽力做到自己身为会长的本分，到处去募集不足的款项，让会所顺利建成。

新会所建成后，公会同仁将礼堂命名为胡重益纪念堂，以纪念胡重益对客属公会的捐助，其他如丘乔、锺森（生卒年不详）、胡文虎、胡曰皆、刘伯群等，对公会亦曾尽其大力，故决定将该五氏历史，撰记于石，立诸礼堂，以作纪念景仰。（见附录图一）（南洋商报，1950年9月29日：7）不难看出，霹雳客属公会会员及董事对于丘乔对公会的贡献也是给予肯定的态度。直到后来1958年，霹雳客属公会附设的深斋学校正式落成的开幕典礼上，刘伯群先生致开幕词时仍然对丘乔等人在如此艰辛的情况下仍成功筹建会所一事大大赞叹。

二、霹雳嘉应会馆

丘乔出任霹雳客属公会会长的同时也是霹雳嘉应会馆的副会长。霹雳嘉应会馆 1950 年庆祝五十周年纪念时，发起了推动设立奖学金的计划，将募捐所得的六千余元悉数作为奖学金，并选出五名委员：主席梁树龄、调查杨汝桓及丘乔、财政叶荣燊（生卒年不详）及秘书姚轶平（生卒年不详）处理相关事宜（南洋商报，1950 年 7 月 26 日：7）。可惜，这个计划一直到霹雳嘉应会馆在 1975 年成立文教部时才正式设立起来。话虽如此，但是严格说起来丘乔也可以算是霹雳嘉应会馆奖学金的发起人之一，而截至 2000 年，会馆共发出了二十二万五千两百三十五令吉的奖励金给考获优异成绩的会员子女；清贫会员子女助学金也发出多达六万三千两百七十二令吉（霹雳嘉应会馆特刊编辑委员会，2000：129-130）。

同年，丘乔也被推举为霹雳嘉应会馆附属学校——明德学校的董事长。丘乔身为董事期间也积极促成教室改建、加辟音乐室及图工室等设施。借着这个机会，丘乔也逐渐开始关注马来亚华社的教育发展。1945 年日军投降撤离之后，马来亚的教育政策也随着政局的改变而不断修改，对华教的发展有利也有弊。1948 年，马来亚联合邦政府成立了中央教育咨询委员会（The Centr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Education）负责提供有关教育政策及执行原则的任务。1950 年，这个委员会建议透过一个共同语文也就是英文为主的教育来建立一个马来亚国家的新概念。这项教育政策一被提出就受到华教人士严厉的抨击。身为明德学校董事长的丘乔深深意识到华教所面临的危机，惟有所有华社团结一致才能谋取华教共存亡的方法。于是，丘乔召开了董事会议后赞同张珠所发起

的将怡保十六间华校统筹统办，设立一个总机构共同处理十六间华校的行政及校务，务求团结起来与政府抗衡。

然而各校董事未曾听闻，纷纷踌躇不前。丘乔于是在怡保各华校董事及代表商讨统筹统办的会议上呼吁所有董事及代表，声称：“当前华侨教育，已面临严重危机，非有空前之大团结，是难以挽救吾国数千年之固有文化，故主张吡叻华教，新有统一机构组织之必要。”（南洋商报，1952年12月12日：7）。经过表决后，出席者一致通过，将该机构命名为「吡叻华校董事会联合会」，并组织一常务委员会，丘乔被推举为委员会总务。

然而，吡叻华校董事会联合会的努力并不止步于霹雳州。《1952年教育法令》颁布之后，马华公会还成立了教育小组，并于1953年和马来亚联合邦各州华校董事联合会以及华校教师总会组成“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通称“三大机构”——共同向政府争取华文教育公平合理的权益和地位（林水椽、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第二册，1998：233）。独立之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蓬勃发展虽然已是题外话，但笔者认为华教的中流砥柱仍是各地区的华人社领袖，而丘乔在这一方面就起了一个带头的作用，促成怡保各华校的团结一致。

三、其他

日军侵占马来亚之际，锡矿业一片狼藉、前景堪忧。日军投降后，为了复兴锡矿业，各州矿业公会团结起来，在敦李孝式（1901-1988）的号召下，于1946年6月14日成立了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丘乔遂被选为首届理事会中的

吉打州董事，之后还陆续蝉联了七届的董事席位——吉打州三届、霹雳州及玻璃市州各两届。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成立之后，首先落实的政策便是呈请政府加强矿地的治安情况，让矿场顺利运行。再者，便是成立赔偿调查委员会处理矿场战后损失的赔偿。虽然丘乔当了八届的董事，但笔者对于他在任期中所作出的贡献及参与程度都不了解，笔者也认为丘乔之所以能连任那么多届的董事席位，想必也有他过人之处，只是这还待考查。

政治方面，丘乔于战后则是参与了吡叻华人参事局⁶，并成为首届参事局委员之一。吡叻华人参事局的成立是作为一个咨询者的角度，尤其是在华社方面的顾问，也提供了英殖民政府与霹雳华社一个沟通的平台。霹雳州华人领袖可代表当地的华人与政府自由交换意见，办理各项事务。一般华人居民遇到问题时，可以透过参事局将问题或意见传达给政府。

总括来说，丘乔在 1946 年到 1953 年之间参与的社团组织比起初期（1938 年-1941 年）来得更多，不再只是局限于单一的地缘性或业缘性组织，而是投入较多的心血在其他跨越方言族群的组织及领域里。除了依旧关心客家同乡，他关注的对象也逐渐转向马来亚的所有华裔族群，期望为华社、华教及华人在各方面都献出了一份心力。笔者认为这可能就如上文所提及的，丘乔在日治时期亲眼见到华人遭受压迫的惨痛经历后感同身受，无意识地对华人产生了互爱互助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投射在马来亚这整片国土就是丘乔一种爱国的

⁶ 吡叻华人参事局是战后首个被成立的参事局，以吡叻州州务大臣鸭都华哈继为主席，华人事务官台维新为副主席，委员有吡劳工司奥克利，谢锦铃，张珠，陈瑞安，胡仁芳，吴寿福，丘乔，孔锦德，刘一清，刘伯群，李瑞荣，梁侃贤，梁宇皋，林清泉，林有清，罗竝先，伍英芳，王振相，杜清财，杜荣和，朱运兴，王秉惠，黄木贵，胡锡康，杨章港等。（南洋商报，1950 年 11 月 19 日：10）

表现。他早期初到南洋时的侨民心态在经历了日治时期的巨变之后也逐渐转变为对马来亚的认同了。

第三节：沉闷期（1954 年-1958 年）

1954 年至 1958 年是丘乔社团生涯也是生命的最后五年。这五年间，丘乔参与的社团有急剧减少的现象，在大多数的社团中也已经退居幕后了（见附录表六），没有较特殊的贡献。

丘乔在这时期较少参与社团活动，笔者猜测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丘乔的锡矿公司在 1952 年至 1954 年间所面临的惨况。1952 年，丘乔在九洞埠所设立的锡矿公司因为拒绝捐助马共份子，惨遭他们放火烧掉停车寮而停办。再加上在拿乞埠、和丰埠及加基武吉王武锡矿公司也都陆续收盘停办。失去经济来源的丘乔可能因此无暇顾及社团活动，遂将重心放到开拓锡矿事业上。其二，可能是因为丘乔的第一任夫人林玉英女士于 1955 年 12 月的离世对丘乔所造成的创伤。丘乔这时候的事业及家庭可说是面临双重打击的情况，才会对社团事务分身不暇。虽然说这两个原因只是笔者的猜测，并未经过证实，但目前没有其他原因出现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这两个打击作为丘乔不再那么活跃于社团活动的原因或许较为可信。

第三章 丘乔对社会的贡献

丘乔平生虽然大部分时候都在发展自己的事业及参与社团活动，但他事业有所成就之后，也不忘回馈予社会。最难得的是，丘乔虽以怡保为主要事业活动地区，但是他到玻璃市州加基武吉埠发展事业时，也时刻关心当地的社区，并且在自己能力范围所及之内对社区建设施以援手。日治时期，丘乔除了捐款协助中央政府抗敌机关购买通讯设备以及收集情报工作（南洋商报，1946年11月3日：2）之外，还介绍工作给不少失业人士，并且在精通日语的友人的协助下救出被日军收押的华人。马来亚光复之后，丘乔也不落后，积极响应英殖民政府复兴社区的工作。

丘乔到拿乞埠开办锡矿场期间就曾经协助迁移及改建拿乞埠列圣宫古庙。列圣宫古庙于大约1929年就建于拿乞埠街场尾，属于采矿地段，而该地段又属英国人所开办的锡矿公司——LAHAT MINES LTD 所有，多年来已有多名矿商到该处开采锡矿，然而却没有人提出迁移庙址的想法。一直到1940年，丘乔到拿乞埠开办新昌兴锡矿有限公司时，与公司股东廖雨棠（生卒年不详）意外得知该庙址锡苗丰富，因此有意继续在庙址附近开采锡矿。然而，采矿行业本来就存有较多忌讳，尤其以不可触犯神灵为首要禁忌，丘乔与股东们也不敢贸然行动，只能向古庙的理事会委员提议迁移庙宇。古庙理事会委员⁷经过多次磋商后，议决接受丘乔等人迁移庙址的提议。由于迁庙是由丘乔等人所提出，因此丘乔与廖雨棠便一并承担了迁庙、建庙及新庙开光的所有费用。在迁移庙址这件事上，丘乔确实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处理方式。不仅避免了双方冲突，还达到了双赢的效果，古庙理事会接受了丘乔等人迁移庙址的提议后确实为列圣

⁷委员有：李智寿、唐宜贵、吴国文、吴水、廖有强、李斯、张凤、张启鸿及陈金水（生卒年不详）。（新明日报特刊，1989年4月3日：25）

宫古庙未来的发展奠下更稳定的基础。然而，丘乔协助迁庙的确切时间却没办法加以证明，只能从列圣宫古庙现悬挂着的鸣谢牌匾（见附录图二）中推测迁移庙址是发生于丘乔到拿乞埠开设锡矿公司即 1940 年至 1958 年间。

虽然迁移列圣宫古庙完全是出于丘乔与廖雨棠的建议，但若不是经过丘乔等人迁庙一事，位于锡苗产地附近的列圣宫古庙原址很可能在经过日治时期及马共时期就毁于一旦，根本就没办法在迁移到现址之后再经过 1997 年的改建才呈现出现在所看到富丽堂的庙宇外观。这是因为日军挥军侵入马来亚时，节节败退的英军本想将矿场及铁船破坏及炸毁，以免落入日军手中。可惜时间紧迫，英军未能得手。虽说日本人侵略时并不毁庙，但是日军投降之后，拿乞埠沦为马共“黑区”，附近的矿场治安堪忧，丘乔在此处的锡矿公司也面临停办。由此可见，丘乔等人将庙址迁出矿场确实让古庙幸免于难。

1952 年，丘乔到加基武吉埠开设加基武吉锡矿有限公司时也对当地的社区建设贡献了不少。据罗伸波⁸（1948-）及蓝基鸿⁹（1946-）口述，丘乔到加基武吉埠发展锡矿业时候就曾经资助过玻璃市加基武吉老人院（Rumah Sejahtera Kaki Bukit）的营运费用。当时，丘乔经营的锡矿公司每出产一担（一百斤）锡米就会抽出五元作为资助费用来维持老人院的营运。据丘乔次子丘才基局绅（1930-）透露，当时加基武吉锡矿有限公司锡产平淡时每个月都有一百二十担左右的锡米产量，而锡产丰饶时期更达七百担左右。依照这样的推算方法便可发现丘乔对玻璃市加基武吉老人院的资助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丘乔何时

⁸ 罗伸波先生是玻璃市加基武吉老人院首届主席——已故拿督罗运通局绅之子，曾听闻父亲提起丘乔事迹。

⁹ 蓝基鸿先生是丘乔加基武吉锡矿有限公司的矿工——已故蓝水木先生的儿子，年纪还小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矿场工作。因此，曾听闻父亲提起丘乔的事迹。

开始资助老人院营运费用，又是何时结束资助老人院的营运就没有实际的资料显示了。然而，笔者认为可以从老人院的成立的时间及缘由来作出推测。

玻璃市加基武吉老人院创设至今已有六十余年的历史，与当地的锡矿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早期，加基武吉埠锡矿业仍属旺盛时，矿工的人数众多，其中也包括很多孤苦伶仃、处境可怜的老矿工。上了年纪的老矿工们行动不便，往往都没办法回到原乡去。因此为了让老矿工们安享晚年，当地居民便发起成立老人院，而当时的矿商及社会人士都应允资助老人院的营运费用。玻璃市加基武吉老人院大约成立于 1949 年前，即丘乔尚未到加基武吉埠开设锡矿公司。因此，笔者推测丘乔是在 1952 年到了加基武吉开设锡矿公司之后，因为想要感谢矿工辛勤工作及想要回馈他们，才开始资助老人院的善举，而这也是丘乔关注照顾同行的一种表示。

此外，罗先生及蓝先生也透露，丘乔在经营矿场的同时还曾经协助将暗窿（Gua Kelam）的拿督公庙迁移到加基武吉街场上去。此拿督公庙原本坐落于暗窿山上，对要上山前往祭拜的矿工及妇人家来说非常不方便。因此，拿督公庙后来也一度被迁移暗窿山脚下，可惜山脚处也并不是个风水佳的好地方。最后几经波折下，丘乔一帮人才找到现在的庙址并协助将庙址搬迁。现今的拿督公庙也在搬迁到街场后经过翻新呈现了更华丽的面貌。

不难发现，丘乔确实将“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精神贯彻到底。远赴人生地不熟的加基武吉埠开办锡矿公司时，他想必也有受到当地居民及矿工的协助才能顺利开拓自己的锡矿事业。而当他事业有成时，他也不吝于帮助需要之人，除了协助迁移庙址，同时还资助老人院的营运。而马来亚经历日治时期

前后，丘乔更是充分地秉持这种精神，自觉地投入维持马来亚锡矿地区的治安及保障当时在马来亚采矿的矿工。

1941年，日军还未占领马来亚之前，丘乔就已经投入到近打工部局所组织的道路防范的工作中。当时吡叻矿务司认为单凭矿务司及工部局的的合作，实在难以分配充足的人手防范一触即发的日军侵略所带来的破坏。因此，为了事前的抗战准备，吡叻矿务司召集了霹雳华侨矿务公会、霹雳矿业公会及矿务农商总局这三大矿务机关，商讨战争若发生时的防范工作。当时的措施是以维护道路情况，避免交通断绝、前后方接济不灵的情况发生，而矿场素来人力物力充足，因此被委以重任。若是某一地段的道路不幸被炸毁，即由附近矿场的矿工协力修补，以利交通。丘乔当时身为霹雳矿业公会的领袖，同时在多个地区设有矿场，因此在这紧要关头，他没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地出席会议，承担下万里望、拿乞、兵如港及赖口四个地区的道路防范工作（南洋商报，1941年9月12日：9）。虽然马来亚最终仍是难逃日军的侵略，但时丘乔在战争一触即发时，仍以维护国家、人民的安危及利益为先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

日军占领马来亚之后垄断了马来亚的经济发展，日本大大小小的公司在日军的鼓励下，纷纷涌入马来亚设立分公司——“组合”及“会社”，占据及控制了原本由英政府及华人所经营的商业及贸易。而这些“组合”及“会社”替日军确保了物资的流通，让日军更有效地掌握了战争时所需要的物资。当时马来亚的重要物资如锡矿、石油、橡胶及铝土等都被日本财阀及日军所委任的“株式会社”所控制。其中，锡矿业由“顺安砂金”、“三井矿山”、“日本矿业”、“东洋矿山”等全盘包办开采、收购和经营（林水椽、何启良、何国

忠、赖观福合编，第一册：97）。这样的经济垄断策略造成了当时失业人数的激增，尤其是锡矿生产行业方面。

丘乔见此，亦想方设法对失业人士提供帮助。于是，他在友人的协助下向当时控制怡保锡矿经营的“东洋矿山株式会社”的社长——太久保安威（生卒年不详）提出了一个看起来虽然是在帮助日军收集锡矿物资可实际上却又能有效率减低失业问题的建议。丘乔向太久保安威提议由他来雇用劳工清洗英国锡矿公司留在矿场里的铁船及沙泵，收集还残留在铁船里的锰尾，因为锰尾尚有些许锡苗及其他矿物。太久保安威先生听后亦同意丘乔的建议，并于昭和 17 年 4 月 1 日（1942 年 4 月 1 日）经由日本军政部颁发了采矿许可证（见附录图三）让丘乔带领矿工们投入采矿工作。集成的锡苗以一担 20 元（须达到七十二巴仙以上的锡含量，未达标则以锡含量的巴仙数来计算）的价格带到怡保矿务局去售卖。

获得准证后，丘乔才开始雇请琉琅妇及男工到铁船及沙泵集中的地点，如金宝、华都牙也、督亚冷及美罗等地，进行淘洗锡苗及烘干入袋然后再卖给矿务局。虽然矿工们通过这种采矿方式赚取的薪资不算多，但是丘乔的这个建议确实提供了当时许多失业人士一个难得的就业机会，让他们在马来亚经济一蹶不振之际仍能赚取微薄收入，养家活口。

同一时间，马来亚沦陷之时，日军为了扑灭抗日力量和镇压民众而在全马各处实施“大检证”“肃清”行动。主要“肃清对象”为：华侨义勇军、共产党员、抗日份子及筹赈会成员及捐献中国政府和资助抗日的分子。（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第一册：93）

当时，许多无辜的华人就被宪兵怀疑是抗日份子而被逮捕关押。霹雳嘉应会馆现任副会长潘东生先生¹⁰（1931-）在受访时就透露，士林河一战后，丘乔到美罗将友人刘仪宾接到万里望之后，两人冒着生命危险，曾经多次与日本宪兵交涉，从日军手中救出了不少被关押着的华人，其中以嘉应州人居多。而救济工作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是因为刘仪宾先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精通日文的他在宪兵与侨领之间的交涉中充当翻译，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才能顺利从宪兵手中救出同乡，让他们幸免于难。

此外，1946年11月3日《南洋商报》就有一篇题为〈怡保五君子抗敌得奖〉的新闻（见附录图四）指出丘乔在日军占领马来亚之时，曾经协助中国政府派遣南来协助抗敌的机关进行情报收集的工作。当时，丘乔与侨领王振东（生卒年不详）、曾智强（生卒年不详）及梁典（生卒年不详）四人，在日军侵占马来亚之时，曾协助地下工作，将有关敌人之情报，及军事动态等，报告予中央机密派遣南来策划及领导组织华侨后援会与抗敌机关之徐白光君（1893-1966）（南洋商报，1946年11月3日：2）。抗战结束后，徐白光将事情始末呈报中央，中央政府特地颁发了奖状给协助者，以示鼓励。丘乔除了协助收集情报之外，同时还提供了金钱上的接济。他与徐白光各捐出四万，曾智强则捐出两万，捐出的金额悉数被用来购置扩音机等工具与外界互通音讯，加速抗战时期的情报联络的工作。

虽然笔者至今仍未能寻获中央政府所颁发给丘乔等人的奖状以作证明，但笔者认为报导中，徐白光先生亲自揭露这起收集日军情报、协助退敌的事件与丘乔有关，那么丘乔协助收集情报这件事还是颇为可信的。再者，日治时期，

¹⁰ 潘东生先生南来之后除了在明德学校就读，也在霹雳嘉应会馆打杂。日治期间也不曾离开怡保，因此熟知当时怡保在战争的情况。

丘乔对当时怡保社会的建树也是有目共睹。除了提供就业机会予失业人士，也救济人民脱离宪兵的扣留，那协助抗敌机关也可能是他会做的事情。而丘乔之所以这么做，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对当时华人备受压迫的经历感同身受，才会受到时代感召、冒着生命危险，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当时的华人及华社。当然，笔者也不排除丘乔不是靠一人之力独立完成收集军事情报的工作，因为丘乔毕竟不谙日语，那军事情报收集的工作便很有可能是丘乔与友人协力完成的。

日军投降之后，丘乔也加入了复兴已经满身疮痍的马来亚的行列。新村设备的不完善、拘留营的人口大爆满、居民尚未办理居民证及屋荒都成了当务之急必须解决的问题。于是，马华公会于 1949 年顺势而成立。丘乔加入霹靂州马华分会之后，也协助当局解决了不少这类的民生问题。

1949 年，丘乔就被选为霹靂州马华分会组织的筹款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负责办理及协助战乱时被迁往穷乡僻壤的居民。除了筹集款项，委员会还设立集中点、在乡村里设立农民学校，还购置新式农具在租借给居民，让居民们提升生活素质（南洋商报，1949 年 8 月 10 日：7）。1951 年，作为吡叻华人福利会理事的丘乔也加入了该会所发起的建筑平民屋的委员会。当时，身为委员会主席的丘乔常在会议上不时呼吁委员小组在最短的时间内展开筹建计划，兴建平民屋以供给一般的受薪阶级，解决屋荒问题（南洋商报，1951 年 8 月 1 日：7）。

此外，战争之后的社区往往容易因为治安管制不好而衍生许多民生问题。1950 年 2 月 7 日，实兆远三条路被暴徒纵火，导致千人无家可归。霹靂州马华分会为呼吁救灾工作而召开了紧急会议。最后决定组织救济实兆远三条路难侨委员会，由马天英为委员会主席，丘乔与黄钦郎为副（南洋商报，1950 年 2 月

7 日：7)。委员会一成立，丘乔等人便立即出发募捐，一共筹得五千四百二十八元。除了发起募捐，丘乔还与一众委员到灾区去视察。同年 12 月 1 日，丘乔也作为霹雳嘉应会馆的代表，响应吡叻高州会馆提出的建议，远赴槟城木麓山拘留营慰问受吉打动乱影响的同侨（南洋商报，1950 年 12 月 1 日：7）。这段期间，丘乔还陆续曾捐献了不少金钱回馈予社区、华校及社团（见表七）。

表七：丘乔所捐善款项目表

	年份	事项	捐献金额
1.	1946 年	捐助抗敌机关购置通讯工具	40000 元
2.	1950 年	捐助实兆远三条路被暴徒纵火案	100 元
3.	1950 年	捐助怡育中筹募经费	100 元
4.	1950 年	捐助吡女中筹募校地基金	100 元
5.	1951 年	捐助栢城街客属总会举行春节联欢	100 元
6.	1951 年	捐助霹雳州养老院老人经费	每月 15 元
7.	1952 年	怡各乡会筹款六千余元将购买食物及用具 赠集中营内同侨	50 元
8.	1952 年	捐助华侨托儿所问题	500 元
9.		筹建怡保客属公会会所	5000 元
10.		筹建霹雳嘉应会馆会所	11000 元
		(尚未计算捐助养老院经费) 约共	56950 元

资料来源： 1. 《南洋商报》：1946 年-1952 年相关报导

2. 霹雳客家公会特刊编委，2015：21

从丘乔对社会的贡献来看，可以发现丘乔所作出的贡献一开始都是对一些地方上的社区建设，而日军对马来亚的侵略可以说是丘乔开始转向对社会作出更广泛的贡献的转捩点。笔者认为丘乔经历了日治时期之后，对马来亚产生了一种国家认同，尤其那时候马来亚正笼罩在大规模的抗日行动中。因此，作为社团领袖的丘乔可能因此受到了环境的影响，再加上之前已有明显的抗日情

绪，因此他逐渐强化了自己身为马来亚华侨的身份认同，并且了解到自己有责任在战争中保护马来亚以及马来亚人民。同时，笔者认为丘乔这种对国家及身份认同的转变也是后来促使他在日治时期之后仍然继续为社会贡献的主要原因。

结语

早期，大多数的矿工来到马来亚后对祖国仍存有深厚的感情，依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再次回到中国去。中日抗战时，华人移民非常积极地筹赈协助祖国抗战的基金，后来马来亚遭日军侵略，还留在马来亚的华人为了存活及利益考量的原因，纷纷站出来为马来亚而战。日军撤离之后，这些曾经与马来亚共患难的华人便潜意识地开始疏离中国，萌生在马来亚落地生根的念头，对马来亚渐生情愫，马来亚也因此替代中国，被视为“新的”祖国。这样的转变更能在一些一代移民的后裔身上清楚地看见。丘乔也正是如此。

丘乔自幼随着母亲一同前来马来亚投靠父亲，在中国正值抗日时期，他身为霹雳矿业公会副会长，除了以身作则捐钱救助祖国抗战，同时也三番四次呼吁会员们应该响应筹赈运动以回报祖国。然而在马来亚遭日军侵占时，丘乔却是义不容辞地站出来捍卫马来亚。无论是战前的道路防范措施，还是战时为失业人士介绍工作及收集日军情报或是战后投入复兴锡矿业及重建社区的工作都显示出丘乔的国家认同已经从中国转向马来亚。然而国家身份认同的转向所涉及的原因非常复杂，尤其与丘乔本身的思想转变有关，而笔者由于资料及时间的不足也没办法再进一步深入研究促成丘乔有这种转变的确切原因。

但无可否认的是，丘乔以锡矿业发迹之后，确实帮助了许多锡矿家及矿工。他通过发起成立霹雳矿业公会，解决了当时锡矿家及地主之间锡固本纸归属的问题。同时，他还透过霹雳矿业公会协助失业的矿工，鼓励失业的矿工到公会登记然后将他们介绍给征聘矿工的锡矿公司。丘乔做的这些事是出于一种对同乡及同业的互助关爱，同时作为首次参与社团组织，丘乔在霹雳矿业公会的贡献也让他小有名气，被大家委以重任。

日治时期之后，丘乔被霹雳客属公会的同仁推举为会长。身为公会复办之后的首任会长，丘乔所作的是积极招募会员及亲自筹募建新会所的经费。不得不提，新会所的建成对霹雳客属公会后来的发展的重要性。新会所的建成更是方便了霹雳客属公会处理会务活动，有了新会所之后，公会陆续成立了国乐部、汉剧团、醒狮团、互助金会、篮球队、羽球队、乒乓队、太极团、妇女部、娱乐部、教育部等。会务蒸蒸日上之时，霹雳客属公会也在会所侧旁倡办了附属的深斋中学，为当时莘莘学子提供了求学的地方。

丘乔虽为锡矿家，但是对教育也十分关心，他在霹雳嘉应会馆任副会长期间就与会馆理事发起设立奖学金开放予会员们的子女及所有欲升学但力不从心的嘉应子弟，以帮助清贫学生完成学业。当时还是明德学校董事的丘乔为了协助华教克服英殖民政府所提倡的以英文教育为主的危机，还大力鼓吹怡保华校统筹统办，成立「吡叻华校董事会联合会」与英殖民政府抗衡。此外，怡保华校募捐建校基金时，丘乔也是义不容辞地捐出款项资助。

在拿乞埠及加基武吉埠开设锡矿公司的时候，丘乔就曾经协助拿乞埠列圣宫古庙及加基武吉埠拿督公庙迁移庙址，还拨出了锡矿公司的盈利来资助了加基武吉埠老人院的经营。与此同时，日治时期之后，社会治安问题，如纵火抢劫、暴乱、孩童及妇孺流离失所等事件层出不穷，热心公益的丘乔事后除了到集中营探访受害民众，也捐出了一些款项支援救助工作。

迄今，丘乔已过世五十八年，他的贡献虽然甚少被提及但却是不可抹杀的。而丘乔的后裔也继承了他造福同乡、热心公益的热忱，继续在霹雳嘉应会馆、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霹雳客属公会、育才中学等组织贡献。本论文

由于资料的匮乏及时间的不足，仍然有许多需要改善之处，惟笔者希望透过此论文能够让读者知悉甚少为人所知的丘乔对怡保的贡献。

参考书目

(一) 专著:

1. Ho Tak Ming (2009), *Ipoh When Tin Was King*, Ipoh: Perak Academy
2. 叶荣燊编 (1965), 《嘉应故乡谈丛》第三集, 马来西亚: 檳城康华印务公司
3. 林水椽、骆静山合编 (1984), 《马来西亚华人史》,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4. 许云樵、蔡史君主编 (1984), 《1937-1945 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新加坡: 南洋学会
5. 颜清煌 (1991), 《新马华人社会史》,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6. 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4), 《梅县志》, 广东: 广东人民出版社
7. 林水椽、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 (1998), 《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全三册,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8. 赖观福编 (1999), 《客家源远流长——第五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 吉隆坡: 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
9. 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 (2002), 《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 马来西亚: 怡保名洙印务公司
10. 何启良主编 (2014),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 马来西亚: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
11. 林忠强主编 (2013), 《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论文集》, 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

(二) 刊物:

1. 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51），《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怡保：霹雳客属公会
2. 霹雳嘉应会馆特刊编辑委员会（1974），《霹雳嘉应会馆七十周年纪念·新厦落成开幕典礼》，怡保：霹雳嘉应会馆董事会
3. 霹雳嘉应会馆特刊编辑委员会（2000），《霹雳嘉应会馆成立一百周年纪念特刊》，怡保：霹雳嘉应会馆董事会
4. 百年纪念特刊小组（2007），《回顾百年》，怡保：霹雳中华工商总会
5. 明德华小特刊编委会（2013），《霹雳怡保华林市明德华文小学百年校庆纪念特刊1912-2013》，怡保：明德华小校庆委员会
6. 霹雳客家公会特刊编委（2015），《霹雳客家公会庆祝成立74周年纪念暨承办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2015年度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特刊》，怡保：霹雳客家公会

(三) 报章:

1. 〈霹雳少额固本锡矿家商妥重要步骤决呈请政府核定固本价格取消固本联络并恩准屯锡两个月〉（1938年5月12日），《南洋商报》，第14页
2. 〈霹雳矿业公会会员大会赞成锡固本买卖统制惟主修正统制条文并须华矿家参与权力陈宝瑜发表三点意见谓须另定佛瑯产额〉（1938年6月14日），《南洋商报》，第14页

3. 〈吡叻矿业公会登记工人介绍工人工作并决加紧援助中英二国抗战昨举行会员恳亲会情况热烈〉（1939年9月19日），《南洋商报》，第10页
4. 〈吡叻矿业公会议决准龙运华工往吡工作并相应劝募援英义捐〉（1939年9月26日），《南洋商报》，第9页
5. 〈吡客属公会自购会址现进行装修改建礼堂定名为胡重益纪念堂〉（1950年9月29日），《南洋商报》，第7页
6. 〈吡嘉应会馆将编纂年刊〉（1950年7月26日），《南洋商报》，第7页
7. 〈华教面临严重危机非大团结无以图存吡华校董代表大会议决组织董事会联合会选出十五名执委负责进行组织〉（1952年12月12日），《南洋商报》，第7页
8. 〈此后吾侨与政府联系更趋密切吡华人参事局成立苏丹劝勉华人团结一致杜荣和代表委员致谢词〉（1950年11月19日），《南洋商报》，第10页
9. 〈霹华农矿商会防范敌破坏道路组护路队守护南北两部举十三区主任负责进行〉（1941年9月12日），《南洋商报》，第9页
10. 〈怡保五君子抗敌得奖状〉（1946年11月3日），《南洋商报》，第2页
11. 〈吡马华分会执委会议决援助僻壤同胞成立筹款委会选出委员〉（1949年8月10日），《南洋商报》，第7页
12. 〈吡华人福利会通过请当局收回养老院办理筹建平民住屋计划主席呼吁小组会从速展开工作〉（1951年8月1日），《南洋商报》，第7页

13. 〈吡马华分会已募得五千余元组委员会救济难侨彼等现分住于新邦知加二校〉（1950年2月7日），《南洋商报》，第7页
14. 〈吡高州会馆联合其他会馆代表定期前往檳城木惹山慰问拘留营乡侨将募款购地为彼等被释后安居〉（1950年12月1日），《南洋商报》，第7页
15. 〈列圣古庙今庆100周年〉（1989年4月3日），《新明日报》特刊，第25页

（四）口述资料：

1. 丘才基、丘才淼、丘才幹（2015年8月5日），“关于丘乔开办锡矿业的情况”。（刘玉敏）
2. 丘才基、丘才幹、潘东生（2016年5月11日），“关于丘乔在日治时期的贡献”。（刘玉敏）
3. 罗伸波、蓝基鸿、张练棠（2015年8月24日），“关于丘乔在加基武吉的动向”。（刘玉敏）
4. 古健庭（2015年8月10日）“关于丘乔协助迁移拿乞埠列圣宫古庙”。（刘玉敏）
5. 赖观福（2016年8月2日），“关于丘乔在加基武吉的动向”。（刘玉敏）

附录

表二：1858 年 1914 年梅州大事记

	时间	事件
1	清咸丰九年 (1858 年)	二月初二日，太平天国将领石镇吉、石镇常率五六万人，由大埔进抵松口、白渡。初四日围攻嘉应州城，经 12 天激战，十六日占领州城，将顽抗的知州文晟处死。
2	清同治初年 (1862-1864 年)	大立堡（现水车镇辖内）一带，约 20 公里范围，松毛虫为害严重，毁坏林木。
3	清同治三年 (1864 年)	七月，大水，洪水之大，自乾隆四十年至此再见。据建国后梅县地区水文站查测，时梅城洪水位为 80.34 米（珠江基面，下同）。
4	清同治四年 (1865 年)	四月，大饥荒。 五月，传染病流行，路有死尸。 夏，酷热，最高气温达 40.5 摄氏。 十一月二十一日，太平天国将领康王汪海洋，偕王谭体元率部 10 万余人，由兴宁进占嘉应州城。十二月十二日，与清军左宗棠部会战于城东塔子凹，康王汪海洋受重伤，是晚牺牲于城内。余部由偕王谭体元率领，于十二月二十二日晚突围。二十四日，在丰顺白沙坝遭清军伏击，偕王谭体元和太平将领何明亮等先后被俘牺牲，周王汪麻子阵亡，被清军收降，斩杀的太平军将士计五六万人。至此，江南太平军完全失败。
5	清光绪元年 (1875 年)	大水，沿江两岸田庐房舍受浸。 城内祠宇共 85 处，知州周士俊下令禁止再建。
6	清光绪十四年 (1888 年)	是年，大水，州城城墙被洪水冲毁。知州金桂馨倡修。城内东北隅夺锦楼旧迹亦同时修复。
7	清光绪十五年 (1889 年)	西阳、丙村、松口一带虫灾严重，毁农作物，路旁草木仅存少许。
8	清光绪十七年 (1891 年)	四月三日，大雨，畲江一带冲毁大批农田。
9	清光绪十八年 (1892 年)	冬，大雪，平地积雪三四寸（市寸），山中积雪二三尺（市尺），气温降至零下四度，为百年所罕见。 是年，州城西街失火，知州吴宗焯令城内商人购买喷水机，以防火灾。
10	清光绪二十年 (1894 年)	七月十日，地震，声如沉雷，从 17 时至次日凌晨 3 时，震动 7 次。
11	清光绪二十三年 (1897 年)	五月，大雨，梅江上游及南口、长滩等地，房屋田地淹没甚多。
12	清光绪二十一年 至二十三年 (1895-1897 年)	连年饥荒，各堡富裕人家平糶大米，赈济饥民。

13	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	鼠疫流行,后每隔二三年便有一次,历时约20年多 久。
14	清光绪三十年 (1904年)	是年,大水,附城高处水涨数尺,据建国后梅县地区 水文站查测,时梅城洪水位为80.6米。
15	清宣统三年 (1911年)	三月,在梅的一批同盟会员和爱国志士饶辅廷、周 增、黄嵩南、郭典三、郭冠雄等30多人组成选锋 队,参加广州“三·二九”起义。饶辅廷、周增英勇 牺牲。 八月,武昌起义成功。九月,同盟会员周辉甫、卢耕 甫、邓石甫、曾涌甫、邓华甫等奉同盟会总部命令, 准备武装起义。 九月二十一日,梅州军司令处成立,知州陈寿璠、游 击白如镜投降,嘉应州和平光复(又称“梅州光 复”)。
16	民国3年 (1914年)	1月28日,13时,地震,不少房屋被震塌。 是年,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议会,梅县县议会被取 消。

资料来源: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4):27-32

表四：丘乔参与过的社团组织及所担任的职位（1938-1945）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1945
霹雳嘉应会馆	董事	董事			暂无资料
霹雳客属公会			董事	董事	
客属总会			委员		
吡叻/霹雳 矿业公会	正会长	副会长		副会长	
吡叻 华侨矿务总会			委员		
霹雳育才中学		注册董事	注册董事	注册董事	

资料来源： 1. 霹雳嘉应会馆特刊编辑委员会，2000：26

2. 《南洋商报》，1938年-1941年相关报导

表五：丘乔参与过的社团及组织（1946-1953）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霹雳 嘉应会馆			司理	司理	副会长	副会长	副会长	副会长
马来亚嘉属会 馆联合会					吡叻代表	霹雳嘉应会 馆任主席	会议主席团	吡叻代表
霹雳客属公会				会长	会长	会长	会长	会长
客属总会							外埠董事	
马来亚 华人矿务总会	吉打州代表	吉打州代表	吉打州代表	吡叻州代表	吡叻州代表	玻璃市代表	吉打州代表	玻璃市代表
吡叻 华人矿务总会						委员		
吡叻 中华大会堂						理事	理事	理事
吡叻 中华总商会						理事	理事	
吡叻广东会馆				执行委员				
吡叻 精武体育会					游艺会委员			
怡保 程江联谊会					董事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乐林俱乐部						委员	委员	委员
霹雳明德学校					董事			
霹雳育才中学							注册董事	注册董事
吡叻安全公债 咨委会							委员	
吡叻 华人福利会				怡保区理事		代理会长		副主席
吡叻马华分会				执委				
近打马华支会				吡叻代表		副主席		委员
吡叻 华人参事局					委员			
吡叻华教 董事会联合会							常务委员会 总务	

- 资料来源： 1. 《南洋商报》，1946年-1953年相关报导
2. 霹雳嘉应会馆特刊编辑委员会（2000）：39-40
3. 霹雳客家公会特刊编委（2015）：20-21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霹雳嘉应会馆	顾问	顾问	顾问	顾问	顾问
吡叻中华大会堂	理事			理事	理事
吡叻中华总商会		董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霹雳育才中学		董事			
吡叻 华侨矿务总会		执委		执委	
吡叻华人福利会	委员				

表六：丘乔参与过的社团及组织（1954-1958）

资料来源： 1. 霹雳嘉应会馆特刊编辑委员会（2000）：41-42
2. 《南洋商报》：1954年-1958年相关报导

图一：霹雳客属公会有关丘乔事迹的石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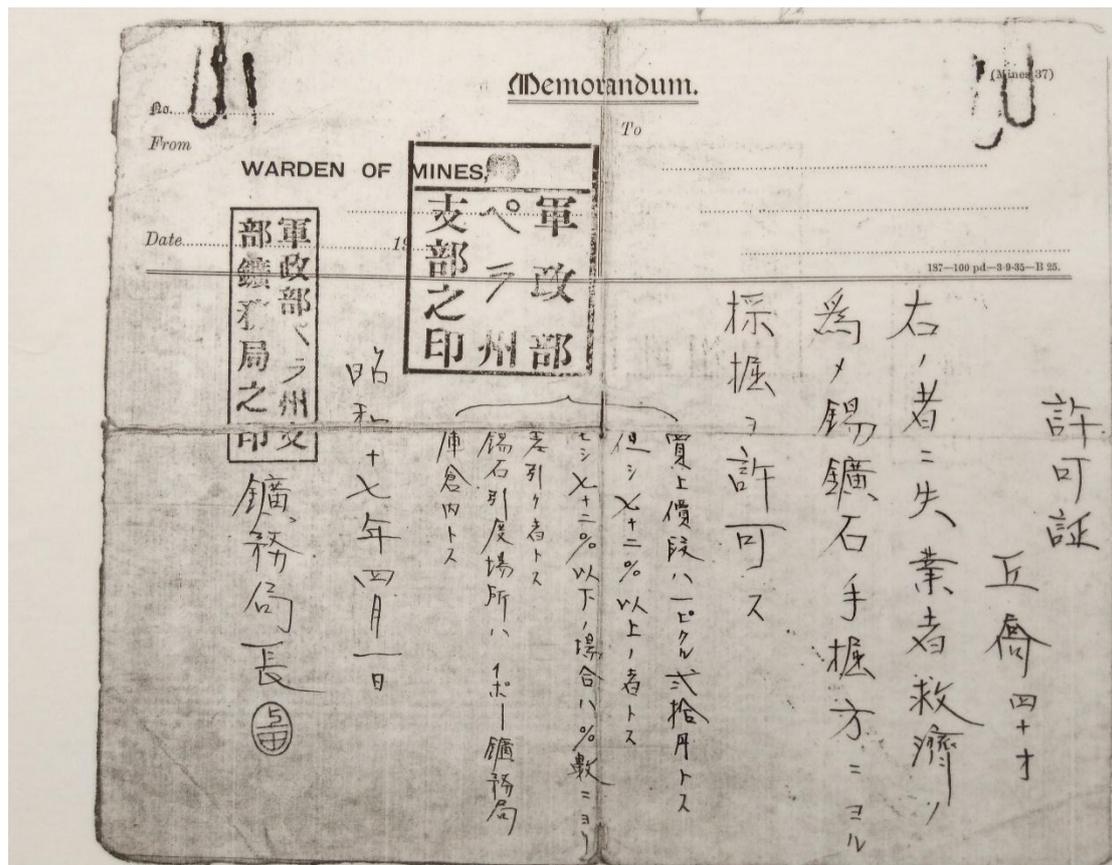
摄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

图二：拿乞列圣宫古庙搬迁重建纪念匾



摄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

图三：日本军政部颁发予丘乔的采矿许可证



摄于 2016 年 8 月 8 日

图四：1946年11月3日《南洋商报》〈怡保五君子抗敌得奖状〉报导

← → ↻ 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461103-1.2.22.aspx 🔍 ☆ ☰

怡保五君子抗敵得獎狀

南洋商报 (Nanyang Siang Pau), 3 November 1946, Page 2

Article also available on microfilm reel [NL1198](#) [Lee Kong Chian Reference Library - On shelf]

★ Add to Citation

Go to « First « Previous Next » Last » Article

怡保五君子抗敵得獎狀

（本報駐怡記者稿）此間僑領王振東，丘喬，曾智強及梁典四君，因於敵寇侵佔馬來亞之閒，曾協助地下工作

，將有國人之情緒，及軍事動員等，假會于中央總籌處南洋策劃及領導組織籌備後援會與抗敵陣線之陳白光君，邊地聯絡利後，徐君若情呈報中斷，茲者香中央黨部，特頒發獎狀，以資鼓勵，即由經過，據稱馬來亞總督，於時思昭，一九四二年八月抗日投德軍，在彼地加籌場一帶成立，當即與彼等聯絡，協謀工作進行，同時又接濟金銀藥物，後復擊兵各州四萬，曾智強等二萬，諸君並曾與英界商會商戰之丁凡。此舉乃以定運路工作，一九四五年，抗日同志與敵以商結盟為第一步，加取個人切實情報，乃由彼出任華僑協會會長後於五月間，忽有一幹部失節，向敵密報彼之抗敵行動，彼等遂建，旋幸得立人士榮生歸回聯絡各方，始得無事，未幾，彼等加抗敵工作，乃於於華人愛國愛黨抗戰之大義，區區之貢獻，實不足道，惟希望吾國人，自今而後，能口無惡言，上民至上海新提，不分黨派，協力建國工作，有徐宜生，謝其章，徐運寬，徐福成，徐華興，黃源隆，曾志和，張步仁，古煥來，陳改良，徐運增，徐森，徐賢徐，徐耀生，徐登雲，李立，徐賢源，古軒增強法蘭

Page Thumbnail



Activate Windows
Go to PC settings to activate Windows.

Scroll to Top

截自 <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461103-1.2.22.aspx>

图五：丘乔葬礼留影



摄于 2015 年 11 月 18 日

图六：丘乔墓碑（一）



摄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

图八：丘乔墓碑（三）



摄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

图九：丘乔在加基武吉锡矿场工作情况



摄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

图十：丘乔在加基武吉锡矿场工作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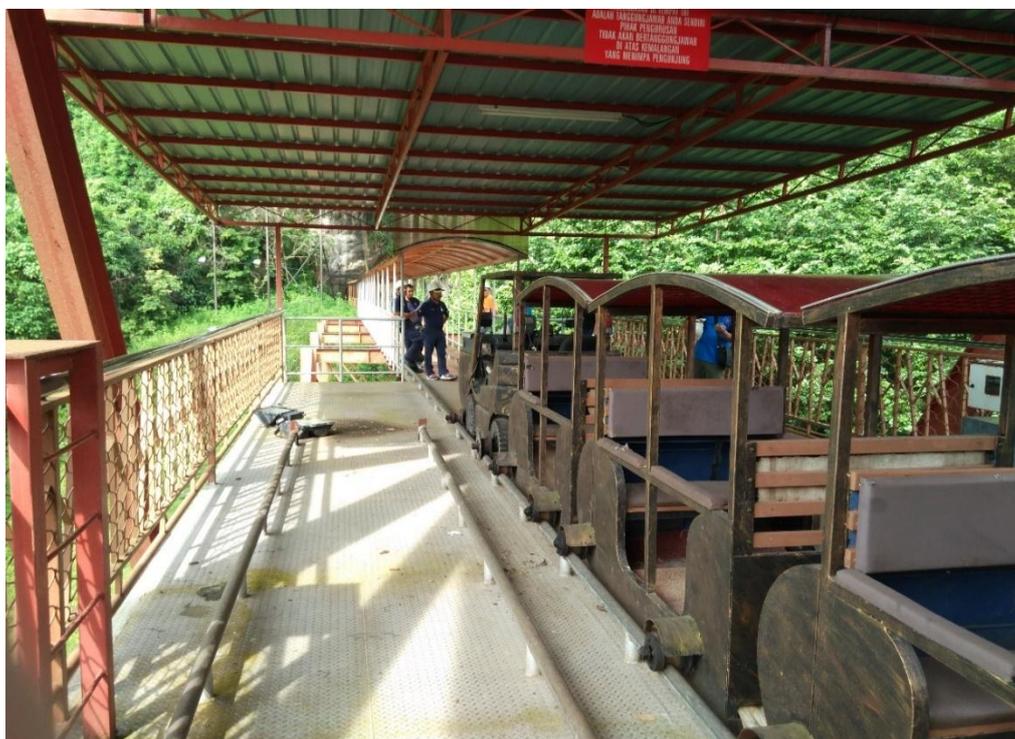
摄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

图十一：已发展成旅游景点的加基武吉锡矿公司（一）



摄于 2015 年 9 月 8 日

图十二：已发展成旅游景点的加基武吉锡矿公司（二）



摄于 2015 年 9 月 8 日

图十三：矿工在暗窿（Gua Kelam）留下的开凿锡米仓的痕迹



摄于 2015 年 9 月 8 日

图十四：较早期为锡矿工人供应电源，经过政府修葺后保存下来



摄于 2015 年 9 月 8 日

图十五：加基武吉埠锡矿山石垅



摄于 2015 年 9 月 8 日

图十六：玻璃市加基武吉老人院



摄于 2015 年 9 月 8 日

图十七：玻璃市加基武吉拿督公庙



摄于 2015 年 9 月 8 日

图十八：霹雳客属公会历任会长照片



摄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

图二十一：各会馆代表前往怡保集中营慰问侨乡



摄于 2016 年 7 月 29 日

图二十二：1989年4月3日《新明日报》特刊——〈列圣古庙今庆100周年〉



宮風水塔

會儀式開始。

- 1：大會主席致歡迎詞。
- 2：恭請吡叻州行政議員准拿督黃家泉致詞。
- 3：工委會主席致謝詞。
- 4：恭請州行政議員全鳴鑼宣佈慶祝建廟百週年紀念。

譚北榮
財政的話

以能够一直屹立到现在的重要因素。
每年農曆三月初三日

發揚光大，元至有類合界善信愛護及鼎力支持，這是我們衷心的一點期望。

威靈顯赫。香火鼎盛

列聖宮古廟乃是公衆神廟，是先賢始創，有悠久史蹟；建設堂皇，是一座莊嚴令人肅然起敬之神廟。本廟玄天上帝座鎮，廟兩旁列有諸神護位，威靈顯赫，古色古香。各方華族信徒前往膜拜者衆，香火鼎盛，朝暮鐘聲响遍雲霄，名聲遠播。

本廟是建築在拿乞埠街場尾，本屬採鑽地段，經過多名鑽商開採后，由丘喬先生，廖羽棠先生繼續探得本廟址錫苗豐富后，建議遷移廟宇，后經拿乞理事會委員李智壽，唐宜貴，吳國文，吳水，廖有強，李斯，張鳳，張啓鴻，陳金水多次磋商后，議決接受遷移廟址，唯一一切建廟及新廟開光費用，由丘喬及廖羽棠負責。

本廟建築在此，計有六十餘年，遷移新廟址三十餘年矣！



工委會主席
戴金財

服務人

拿乞埠列聖宮廟
祝建廟一百週年紀念
屆時相信必有一番
。本人忝友工委會



總務：張必昌

史性的日子，尤其會先賢的管理下，向來強調合作及自的鞭策和支撐下，我們也非常感謝作與支持，同時再私分明的原則下，另一方面，由於欠完善，因此，希宮廟宇更輝煌，香聖的庇佑下，風調我謹以簡短的幾

摄于2015年8月10日